

试论宋代文人的自然情结

张保宁

(西安外国语学院 社会科学部, 陕西 西安 710014)

摘要: 宋代文人的山水佳作, 多维度地表现了他们“善适”自然、“取乐”自然的愉悦情怀。主体诗心与山水清音相契合, 在亲和自然时不忘亲民劝农, 在放情山水中砥砺高洁品性, 从自然审美进向精神超越, 从感悟自然进向探求真理(包括推求物理和感悟哲理), 实现了精神境界的层次性提升。

关键词: 宋代文人; 自然情结; 自然审美意识; 精神超越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一、亲和自然而不忘亲民劝农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崇尚自然的情怀, 这种情怀尤以宋代文人为甚。只要随意翻开两宋文人留下的众多诗文, 就不难发现他们同自然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北宋诗人梅尧臣在《览翠亭记》中说:“景虽常存, 人不常暇。暇不计其事简, 计其善决; 乐不计其得时, 计其善适。”这种把人作为山水的欣赏主体的观点, 无疑代表了两宋大多数文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基于这种善适态度, 宋代更多的文人留下了陶醉于自然山水的身影。王禹偁在黄冈, “公退之暇, 被鹤氅, 戴华阳巾”郊游(王禹偁《黄冈竹楼记》)。欧阳修在滁州, “仰而望山, 俯而听泉”(欧阳修《丰乐亭记》)。苏舜钦闲居苏州, 舟游自在, 与“鱼鸟共乐”而洒然忘归(苏舜钦《沧浪亭记》)。苏轼更是超然物外, 流放黄州时干脆“纵一苇之所如, 凌万顷之茫然, 浩浩乎如凭虚御风, 而不知其所止”(苏轼《前赤壁赋》)。两宋文人之所以这样醉心于自然, 除了与他们大多政治失意、屡遭贬谪这一社会原因有关外, 更与其主观上对自然的向往和钟情分不开。他们“善取乐于山泉”(曾巩《醒心亭记》), 临高远视以“取心意之快”(梅尧臣《览翠亭记》)。在他们眼里, 幽芳乔木, “风霜冰雪, 刻露清秀, 四时之景无不可爱”(欧阳修《丰乐亭记》); 在他们心中, “丰草绿缛而争茂, 佳木葱茏而可悦”(欧阳修《醉翁亭记》); 他们以自己的旷达胸怀, “纳烟云日月之伟观, 揽雷霆风雨之奇变”(陆游《烟艇记》), 把自己的情感寄寓于一山之隅, 一泉之旁, “其心洒然而醒”(曾巩《醒心亭记》)。在两

宋文人的生命历程和情感世界中, 真正和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 形成了一种深沉的自然审美意识, 亦即一种把生命和情感对象化于自然的情结。

两宋文人有自然情结者, 多为兼济天下、心系苍生的人, 著名代表人物如王禹偁、范仲淹、苏舜钦、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他们或胸怀变法改革之大志, 以图振兴国家安富天下; 或心存收复失地之宏愿, 以抗外侮重建河山。尽管他们的大志和宏愿难以实现, 有的甚至遭贬谪流放或被投闲置散, 但他们兼济社会的理想志向却始终不变。他们在抱负难以施展的困境下, 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寄托于山水, 用对自然的热爱来曲折地表达其对逆境的不满和抗争。北宋初年写下《待漏院记》的王禹偁, 积极主张变法, 然而却屡遭贬谪。虽在商州的困苦条件下难遣苦闷心情, 但“不随天艳争春色, 独守孤贞待岁寒”的坚贞操守却始终未变(王禹偁《官舍竹》)。“平生诗句是山水, 谪官方知是胜游”(王禹偁《听泉》)。他在沉浸于悠悠野兴的胜游时, 又不忘自己亲民劝农的责任, 依然积极关心农事, 提倡开荒种地, 鼓励“相助力耕”, “愿得人间皆似我, 也应四海少荒田”(王禹偁《番田词五首》之四)。诗中那真切诚挚的美好心愿, 无疑来自于诗人对底层群众的关爱和对农事的关切。宋初政治革新家范仲淹不仅重功德业, 也向往自然胜景, 虽遭贬谪而乐对山水, 他在《岳阳楼记》中描写洞庭湖壮丽景色:“长烟一空, 皓月千里, 浮光跃金, 静影沉璧, 渔歌互答, 此乐何极!”也正因为作者对大好河山有如此特别亲切的感受, 才能孕育出他那阔大的人生襟怀和崇高的理想追求:“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忧患精神和政治情怀, 与“山水清音”的自然审美

意识是紧密结合的。

两宋像王禹偁、范仲淹这样的文人还很多。他们被贬谪后，一方面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感受河山之美；一方面仍不忘治理河山，尽力为当地百姓办实事。如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范仲淹《岳阳楼记》）；曾巩在齐州，为防州城水害，主持兴筑“北水门”工程（曾巩《齐州北水门记》）；苏轼在杭州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等等。以上事例都说明，这些贬谪文人虽然寄情自然，却始终不忘社稷百姓。他们并未在回归自然中消沉，相反往往从亲和自然中获得精神力量，增添了兼济天下的责任感。

二、从“取乐”自然进向精神超越

宋代文人情钟自然，不能仅仅认为是善适自然的行为，其实更应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如前所说，两宋贬谪文人在失意之时，往往投身于自然，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感悟，获得精神的解放。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几乎是经历了一次劫难，可他一旦泛舟赤壁之下，面对澄明之月、浩淼江水，将要枯萎的心胸旷达起来。他借景与客纵论“变”与“不变”的哲理，现实人生的苦闷一扫而光。苏轼苦闷的精神得到解脱，在其弟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中有记载，请看如何快意的描写：“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州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聘骖，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这是为江山形胜而快意，也为凭吊历史英雄而快意。难怪苏辙在篇尾大发议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保适而非快？”的确，只有放情于山水而乐其所乐，才是人生最快意之事。这种大彻大悟式的议论，无疑道出了两宋文人们钟情于自然的真正原因。苏轼长期遭贬辗转在外，面对逆境，他能超然淡泊，把一腔热情寄寓于山水之间，完成精神上的超越。在密州，他吟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岭南，他笑谈“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苏轼《咏荔枝》）；在黄州，他畅论清风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适。”（苏轼《前赤壁赋》）像苏轼这样钟情于自然的旷达之士，历史上又有几人能相比呢？

两宋文人屡遭贬谪而寄情自然，也是他们鄙视名利、洁身自好品质的表现。梅尧臣一生仕途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地方小官，但困顿的生活经历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相反，诗人反而为身处偏僻小郡能饱览山川之

美景而感到欣慰。在他看来，官府之事和经商之举皆不能使他动心，唯有站在览翠亭上临高远视，观赏山川景色的变化之美，把自身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才是“心意之快”。“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梅尧臣《鲁山行》）如果没有一种对紫陌红尘的鄙视和对自然之景的深透感悟，是决不能勾画得这样清新纯净的。又如与梅尧臣齐名的苏舜钦，遭到革职长期放废，闲居苏州沧浪亭，这使他对自然与人事有更清醒的认识，将恬静的水乡风光与往日仕途的险恶相对比：“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反思向之汨汨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苏舜钦《沧浪亭记》）在诗人看来，尔虞我诈的官场是“溺人至深”的陷阱，一旦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他能有沧浪之美景来陶冶性情、克制利禄之欲而欣幸：“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见乎内外失得之源，沃然有得，笑傲万古。”（苏舜钦《沧浪亭记》）也正因为有此“不与众驱”和“笑傲万古”的清标，诗人才能写出“应愁晚泊喧卑地，吹入沧溟始自由”这样放情万里的快人之作（苏舜钦《和淮上遇风》）。

另外，两宋文人情钟自然，还表现在他们善于借自然之物来表达自己的高洁品性。周敦颐笔下莲的形象，便是典型例证：“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敦颐《爱莲说》）莲的品格，是作者自己人格的形象写照，作者借“爱莲”歌颂坚贞的气节，鄙视奔名逐利的世态，表现的是高尚的风标和高洁的情操。再如苏洵笔下的“木假山”形象，或“魁岸踞肆，意气端重”，或“庄栗刻峭，凛乎不可侵犯”（苏洵《木假山记》），表现的是凛然不屈、独立不阿的精神品格。又如林逋笔下的“小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林逋《山园小梅》）这种神清骨秀、幽独超逸的气质，无疑也是诗人“弗趋荣利”、“趣向博远”思想性格的写照。

三、从感悟自然进向探求真理

两宋文人钟情自然，不仅在自然审美中怡情悦性放旷胸怀，而且还善于从自然中发现和探求真理，增强生活的信念。王安石在宋代文人中独以“识见卓拔”著称，这与他善于在自然中观察物理的求知态度和探寻哲理的精神分不开。一篇《游褒禅山记》，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有关“褒禅山”的来历介绍和相关考证，更重要的是作者“深思”、“慎取”的求是态度。（下转第59页）

上的影响而导致文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在“左”的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论”和“全面专政论”被引入思想文化领域,使这一领域成为阶级斗争的重灾区。“文化大革命”进行“史无前例”的政治批判和残酷斗争,导致大革文化的命的恶果。与那种“左”的指导思想相对应,在运作方式上则采用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方式和“四大”方法来代替学术争鸣和思想教育,陷入畸化的批判运动怪圈。第二,从文化建设主体来看,由于对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而导致知识分子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对于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即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属性上不属于工人阶级,致使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情势下,从“团结”、“改造”的对象沦为“批判”、“专政”的对象,逃不出“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魔障。鄙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倾向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严重地破坏了人才队伍建设。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文化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思想在中国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曾作了精辟论述。列宁曾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概括为“文化革命”,其主要内容

包括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科学文化的繁荣,对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等。毛泽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理论的基本原理和重要思想,提出了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指明了正确方向。它的精神实质和核心内容及其文化方法论,经过历史的考验而显示出理性的生命力,并且为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核心所直接继承、坚持和发展,熔铸在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和江泽民的文化建设纲领之中。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5] 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6.
-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于华东)

(上接第55页) 他借游山引发人生感悟:“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险远”,而要想达到这个境地,就必须“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这无疑是作者身心投入自然而悟出的,它表现出作者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沈括是爱对自然规律进行探索的科学家。他任官外巡期间,总不忘对自然物貌进行实地考察,如由雁荡山等地形地理认识水的侵蚀作用,从太行山岩石中的生物遗迹推知冲积平原的形成过程等。沈括已经不是单纯的借自然来陶冶性情,而是自觉地去审视自然、探寻物理。由于他的这种努力,使中国古代的地质学研究在世界地质学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宋代文人中,既能借自然以陶冶性情,实现精神的超越,又能从自然中感悟事理,阐发事物规律的,苏轼是突出的一位。他的《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仅写出了他对庐山风光奇异无比的惊叹,而且借观赏庐山道出了一个哲理:人们看问题要全面而不要片面,要客观而不要主观臆断。他的《石钟山记》,写于由黄州徙汝州的途中,是他一生中最困苦之时,然而他还能身临其境,对石钟山进行实地考察,辨明石钟山得名之由来,并从中悟出一个通理:对任何事物作判断,必须“目见耳闻”,认真调查研究,弄清事物真相,而

不可主观“臆断其有无”。这种征实致知的精神,无疑与其对自然的热爱和崇尚有关。

四、余 论

两宋文人放情山水乐其所乐,最直接的意义是产生了一大批吟咏山水佳作。这些作品在题材和艺术方面对宋以前的同类作品有所借鉴,更有所突破。综观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了作者们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赏心悦目中用心去感悟自然的美丽,进而把自己和自然化而为一。这正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所说:“山水之乐,易得而不易得,不易得而易得者也。”那么谁能得山水之乐呢?“乐者不得,得者不乐;贪者不与,廉者不夺也。故人与山水两相求而不相遭。”(杨万里《景延楼记》)两宋文人大多就是这样一些身处困境而志洁品高,“与山水两相求而不相遭”的清廉之士,所以他们一旦投身自然,是多么倾心而忘情!

总体而言,两宋文人的山水作品,是一批宝贵的艺术财富,它们给后世以殷殷滋养,使人既能获得美感享受,又能接受爱我河山的情感熏陶和探求哲理的理智启迪,多读常读,何乐不为?

(责任编辑 于华东)